

会是很有帮助的。

【译文选载】

有关新宗教和教派的经验研究

——实践和伦理的考虑

詹姆斯·T 理查森 (JAMES T. RICHARDSON)

马雪峰译

进入一个新宗教群体(有时普遍地指一个教派),引出一些独特的策略性和伦理性问题。有几种进入的可能途径,每一种途径都有自身的一系列问题。本章将对几种这样的途径进行讨论,描述每一种途径面临的困难,以及对于这种研究在方法上的优先选择和建议。

在讨论对于完成参与观察研究这种最明显的策略的各种途径之前,必须指出其中关键的一点。虽然参与观察对于揭示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信仰、和实践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这种单一的方法通常并不能揭示对于认识一个群体而言是必要的一切。对于获得一幅完整而精确的图画而言,各种途径的“三角测量法”(triangulation)是最为有用的。研究者应该研究这一群体所出版的各种出版物,如果可能,包括他们的“神圣的文字”。研究者也应该和那些了解这一群体的情况的外人交谈,包括批评者、支持者以及其他。

当研究当代的新宗教时,这种宽泛的方法要求研究者利用来自前群体成员、群体成员的父母和朋友、与这一群体的成员有联系的政府官员、以及对于这一群体了解和感兴趣的专业人员的信息。外人常常对于特定群体有一种否定的看法,所以我们在评价来自外部的信息时必须谨慎。在解释这种信息时,应该考虑否定的可能性。虽然如此,应该利用所有可能的材料来源。至少,发现他人对于这一群体的看法将揭示一些在研究中,包括在与所研究群体的直接联系过程中可继续追查的有意义的问题。

与利用多种信息来源的思想相联系的是“多方法”的路径。前面已经提到了对群体出版物的内容分析,以及与有选择的外人,如果可能包括前群体成员进行的核对。研究者也应考虑一个访谈时间表,或者至少就一些问题与群体的成员和领袖来讨论。很可能地,对群体领袖的更加无中心的、深度的访谈方法将会是最有用的。有时,标准化的人格评估手段和态度量表将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在作者从事有关新宗教研究的20年中(见Schwartz,1970,另一个多元方法的运用的例子),上面提到的所有方法都以各种的组合方式被运用。与只孤立地使用一种方法(甚至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基本的方法,即长期的参与观察方法)的研究相比,多元方法的路径能获得一个更为完整的图画。

新宗教参与观察方法论

对更新的宗教的参与观察必须在对其群体文化深入“理解”(Verstehen)的基础上,认真地



加以考虑。如果没有找到进行参与观察的途径，那么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例如，如果群体是极端独裁的，如果研究者在没有对群体的领袖说清楚有关研究的情况时就简单地试图对群体成员进行访谈，那么，研究有可能马上就搁浅。群体的领袖有可能对于这种闯入感到心烦，把研究工作视作对他权威的挑战，群体成员不知道是否应该向研究者提供信息，因而不会与研究者的充分合作。获得群体领袖对于研究的最初的批准将带来群体成员的较高的参与率和较直率的回答。这种情况，曾经发生在几年前笔者和一些研究生对一个称为夏伊洛（Shiloh）的浩大的耶稣运动（Jesus Movement）群体做的研究中（见 Harder, Richardson, 和 Simmonds, 1972; Richardson, Stewart, 和 Simmerds, 1979, 特别是后者很长的研究附录）。

虽然在实际研究中的区分并不明显，有关宗教群体的参与观察通常“二分”为两种类型，要么是“公开的”，要么是“隐蔽的”。在每一种大的类型里，或许存在一些重要的亚类型。首先，我们将讨论隐蔽的方法，其中所有的方法，通常都是有问题的。

隐蔽（Covert）的或秘密（Secret）的方法

有关新宗教的隐蔽研究，可以由经过社会学方法训练的人详细指导或训练的，具有被研究群体的意识形态的信徒来完成（见 Bellah, 1974）。找到这样一个信徒本身也许就是困难的，或者，如果能找到这样的人，那么，使他们保持一定需要的客观性或许是成问题的。如果这两个标准都能够满足，那么，这种方法的潜在效果将是非常显著的。根据研究群体的特征来选择相应“匹配的”研究者，这种方法虽然是不被推荐的，但被称为一种“秘密武器”，许多群体所对此几乎不设防（Richardson 等, 1978, p.239）。哈登（Hadden）（1977）指出，之所以考虑这样一种方法（但并不必然是隐蔽的方式），是因为“与那些疏远和超然的观察者相比”（p.308）它保证了能够揭示更多的东西。

虽然有可能根据被研究群体的特征来选择“匹配”的研究者，通过各种方法最大化地收集信息，但隐蔽地进行这种研究将会带来特别严重的伦理的甚至心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通常使这种研究方法被排除在外。那些没有运用“匹配”而进行的隐蔽研究，已经引起对这些多重伦理问题的关注。斯通（Stone）（1978）严厉批评这种隐蔽研究，并且指出这种伦理问题有可能妨害联邦和大学对人文学科研究的指导方针。他补充说：

隐蔽的研究有可能促进一种扭曲的观察，因为它建立起一种动力机制：这种连续的守密，必须依靠发现一些值得谴责的因素，来证明这种“欺瞒”的正当性。选择性认知的自然倾向会被夸大，偏向一种在这些宗教中不断发现“荒谬”和“邪恶”的方向（p. 146）。

巴克（Barker）（1987）也间接指出了与隐蔽研究相联系的问题：

隐蔽研究的研究者不仅可能被他们所提问题的类型和所访谈的对象的范围所限制，而且，他们有可能比公开的参与观察者经历更严峻的心理压力，并且，这种压力将可能影响他们完成研究的能力。

霍曼（Homan）（1980）与布尔默（Bulmer）（1980）有关隐蔽方法的交流也讨论了这种策略对于田野工作者人格的冲击，以及有关这种研究的其他问题。



一些已经完成的有关宗教群体的著名研究，至少部分地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进行的，包括费斯廷格（Festinger）、里肯（Riechen），和沙克特（Schachter）(1956)所做的《当预言失败的时候》（*When Prophecy Fails*），以及 Lofland（1977）的《末日信徒》（*Doomsday cult*）。两个研究虽然有其经典性，但在伦理和实质基础方面都遭到批评。斯通（Stone）（1978，p.150）指出，Lofland 的方法促成了他人将他的研究群体——统一教团（Unification Church），通常称为文鲜明统一教团（Moonies）——看做是古怪的。他说，由于其是作为一个隐蔽的观察者，Lofland 忽略了这一群体的一些重要的方面。但，斯通（Stone）也承认，Lofland 在他的书的 1977 年版的很长的结语中更深入的处理平衡了较早的解释问题。

事实上，Lofland 主要使用的是被称为公开的或开放的参与观察法，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这一点。但是，他确实认可了一个研究生以假装改变信仰的方式对一个研究群体的渗透，并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研究生成为他主要的信息来源。经过大约一年的研究之后，Lofland 被要求离开那一群体，在他进行研究的那段时间里，群体领袖将其视为一个潜在的皈依者。这次，Lofland 做一个与这一群体有关的论文，想保持某种联系，所以，他认可了秘密通知人的使用。

费斯廷格（Festinger）等人（1956）对隐蔽方法的使用，甚至存在更为严重的问题。它们的做法在艾丽森·卢瑞（Allison Lurie）（1967）的优秀小说《想象的朋友》（*Imaginary Friends*）中被滑稽地模仿。除了存在严重的伦理问题以外，有一点看起来是清楚的，即，在他们所研究的群体中四个秘密观察者的使用，对于被研究群体的文化，相应地对于他们所大量宣传的调查结果中的大量发现有一个戏剧性的影响。就方法论附录中的陈述而言，有人可能会激烈地争辩说，如果研究者对于群体生活的进行没有太多的干扰，那么，可研究的东西几乎是没有了。费斯廷格（Festinger）和他的核心研究人员派出那些隐蔽的观察者，谎称具有戏剧化通灵经历，这对于群体的领袖有一种巨大的确证作用。这种渗透发生在群体的一个低潮时期，而新成员与其“保护神”进行了“明显”沟通之后所带来的狂喜，给群体领袖带来新的精力和决心去推进其各种计划和预言。

费斯廷格（Festinger）及其同伙对于他们的研究策略对于被研究群体的影响所导致的效果感到很惋惜，但他们作了一个颇有问题的声明说，他们没有其他的办法来进行这项研究。他们也断言说“在避免对于主要因变量的（改变信仰的行动）影响方面，他们完全是成功的”，鉴于相对而言大量“皈依”的观察者进入群体而给群体带来新的活力，这一宣称也是颇值得质疑的。这些研究者在其研究方法附录结束时声明说，他们的发现的效果是如此显著，以至于不可能是由于该研究对群体的影响所造成的。然而，根据其附录中所描述的对被研究群体的影响程度，这个保证声明看起来似乎是“黑夜里吹口哨——给自己壮胆”。

全面地加以考虑，有关新宗教的隐蔽的研究方法似乎是存在问题和不必要的。实际上，秘密报告人的使用可能严重地妨碍对于研究所需要的各种信息的获取渠道。与隐蔽的或秘密的方法的使用所带来的伦理困难有关，心理问题也将随之产生。有一些情况可能要求隐蔽的观察，但这种例子应当是极少的。

研究者应特别谨慎地避免采用隐蔽的方法来代替艰苦的工作，这些艰苦的工作对于研究者与他们希望研究的群体建立友好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见 Barker，1987，对于发展和保持友好的关系所需要的努力的一个很好的讨论）。大多数使用隐蔽观察的研究（甚至包括 Lofland 和 Festinger 等人的研究），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即这种策略是没有必要的，或者是应该被限制的。相当大程度上，研究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所需要的信息也可以通过更多的公开的方法来获得。这



就是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内容。

公开的 (Overt) 或开放的 (Open) 研究方法

通常，有关新宗教研究的公开的或开放的研究方法比上面所提到的隐蔽的方法有更好的效果。伦理方面的考虑减少了（虽然不是完全消除），并且，研究能够扮演 Trice（1970）所描述的那种“外人角色”。这样一种方法在安排上是耗费时间的，但在长期来看，这种方法将取得更好的效果。

有关在研究一个主要的耶稣运动（Jesus Movement）群体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早期讨论表述道（Richardson 等人，1978）：

欺骗是非必需的、不实际的和不道德的。一种更加公开的研究方法看起来（或许也将是）是人道的和更道德的，并且……是研究者可能严肃对待其他人的信仰的一种证明。从一种实践的观点看，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似乎更真诚，通常能从人们的互动中偿到“真诚的果实”（p. 238）。

上面的斜体字表明，我们确认了甚至于一种看起来开放的、正大光明的研究方法也面临伦理问题的可能性。这里的*可能性*，我们指的是在研究方法与被研究群体的文化之间的一种独特的迷人的互动。这种可能性部分源于这样一种事实，即美国社会中的大多数宗教群体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福音派的新教会。为了在我们这个“宗教的自由市场经济”中生存下去，他们必须吸收新成员，或者至少向新成员开放。这种特点使他们对外人，包括研究者的各种渗透通常很少戒备。因此隐蔽的研究策略在这种程度上是有效的，即愿意伪装其兴趣或者假装皈依者通常能够进入这一群体。隐蔽的研究方法的这种便利对于研究者是有很大的诱惑力的。但是，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这种路径，对于隐蔽的观察者获得所需要的关键信息来说，是有一定局限的。

另一方面，采用公开的研究方法的研究者也能够利用这种对于新成员的开放性。许多采用更加开放的研究方法研究宗教群体的研究者指出，他们很快就被定义为潜在的皈依者，群体的领袖和群体成员认为他们是被送来皈依的，所以对他们格外重视（例如见 Barker, 1987; Gordon, 1987; Harder 等人, 1972; Lofland, 1977; Richardson 等人, 1978, 1979; Robbins, Anthony 和 Curtis, 1973; Rochford, 1985）。

这种被看作是潜在的皈依者的可能性是存在于群体意识形态中的任意的二元的被动的倾向性的混合物，在美国宗教中，这种混合并不稀罕。这里的“二元”，我们指的是把事物对分为两种中的一种，例如好的或恶的，神圣的或非神圣的，得救的或不得救的。“被动性”指这样一种信念，即全知的力量是世界的主动的动因；一切源于强有力的动因的承认和引导。所以，当研究者在这样一种场景下出现的时候：即为了皈依的目的被上帝送到这里来，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群体通常视研究者为潜在的皈依者。这种定义的结果是研究者受到很多不必要的关注。（见 Rochford, 1985, 25 页, Hare Krishna 对这样一种情况的描述）。这种关注也可能包括这样一种意愿，即作为说服研究者加入“神圣团体”并且帮助向别人传播真理的努力的一部分，可以共享各种信息。由于在面临一种被感知的神性的行动时的相对的被动性，群体可能发现要求研究者离开是困难的，出现了有关道德的进退两难的可能性。

研究者能够鼓励被调查者把自己定义为“皈依者”，并且利用这种定义。这种诱惑吸引人的



本质不可忽视。对于研究者而言，扮演潜在的皈依者的角色的压力是极大的，研究者很快就认识到，这种扮演的结果是至少在短时期内得到更多的关注以及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在以下这种情况下，诚实是困难的：当研究者意识到完全的诚实的结果将有可能失去来自关键的群体成员的信息渠道，也许，当这些人试图向研究者证明什么的时候，无意中扮演了信息报告人的角色。

这种情况下的紧张与冲突的可能性是真实的（见 Rochford, 1985, pp.22-27; Schwartz, 1970, p.241）。有人甚至指出，在对研究者开放的新教群体中作长期的研究是不可能的。Robbins 等人（1973）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研究者安东尼（Anthony）单独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的基督徒世界解放阵线（the Christian World Liberation Front）做参与观察，在这种情形下，对于群体而言，研究者的目的是公开的。他试图贯彻 Robert 贝拉（Bellah）（1970）称为象征现实主义（symbolic realism）的东西。

以这个术语，贝拉（Bellah）的意思是，研究者在他或她的解释中，应该避免还原论，应该严肃地对待所研究的群体的信念，视其为真实和值得尊重的（Bellah, 1970, 1974）。安东尼（Anthony）在其田野工作中对这种方法的使用，其研究目的是公开的，以一种非直接的 Rogerian 方式与群体成员互动。但是，他做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决定：不与群体成员讨论他的个人宗教信仰问题。像预料的那样，他最初被视为潜在的皈依者，并且，他也因这种定义而获得了方便。然而，最后，强烈的紧张关系发生了，研究接触被中断。Robbin 等人记述了在一个“限制性个案（limiting case）”中的研究检验，在这个例子中，象征现实主义不能实现。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和助手持不同观点，因为在两个出版物中（Richardson 等, 1978, 1979）我们注意到，这一研究持续了七年多，而且是用一种对研究群体公开的方法完成的，并且，所研究的群体也是极端的新教群体。与被研究群体之间的持续的、肯定的和谐关系与安东尼（Anthony）在基督徒世界解放阵线（CWLF）的研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差别可以归结为几个因素，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在夏伊洛（Shiloh）的研究者并没有避免与被访谈者讨论研究者个人的信仰。研究者并不鼓励这种讨论，但他们也没有禁止。在与群体的领袖进行这种讨论过程中，研究小组的领导（三个作者）也包括在内，这种讨论常常带来对群体的深入的观察。有时，甚至当被访谈者要求与此有关的交谈时，访谈者并不被禁止进行这种讨论。

这种方法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我们严肃地对待被研究群体的信仰。我们与群体成员讨论一些显然是重要的事情的意愿向被研究群体表明，我们并不只是把他们看作研究的对象。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发生的互动过程对于我们所关心的所有问题都是有意义的，在不时进行的这随意漫谈式的讨论中，我们对于被研究群体的信仰体系和信仰事件的理解得以更深入。在互相尊重甚至互相信任的气氛中，研究得以进行，这种信任，使我们对于群体文化有一定程度的“理解”（Verstehen），否则，那将是不可能的。

戴维·戈登（David Gordon）（1987）在一篇论文中也讨论了一种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允许与研究群体就重要的问题进行公开的互动，当然，也与 Robbin 等人（1973）持同一种观点。他在几个耶稣运动（Jesus Movement）群体中作研究的经验与本文作者及其合作者的经验类似，与安东尼（Anthony）在基督徒世界解放阵线（CWLF）的研究形成鲜明的对比。戈登（Gordon）警告说，对于与被研究群体建立和谐的关系而言，公开的研究策略几乎会造成过分的效果，他建议，即使在公开的环境中，也应采取与被研究群体保持一定距离的策略。戈登（Gordon）利用了波尔纳（Pollner）和埃默森（Emerson）（1983）的著作，波尔纳（Pollner）和埃默森（Emerson）提出了几种疏远的策略，包括“排除”（preclusions）和“声明”（declaration）。“排除”（Preclusions）



是指事先尽量避免大的错误和卷入被研究群体的复杂事务。“声明”(Declaration)包括直接地拒绝做某事的邀请。虽然戈登(Gordon)从未拒绝讨论他对于宗教的看法,但两种方法他都能够成功地运用。

很显然,即使戈登(Gordon)不是一个准备皈依的人,这种策略使群体成员能够把戈登(Gordon)作为一个他们所尊重的人来接受。简而言之,群体成员开始在他的专业的角色的意义上来接受他,就像戈登(Gordon)所说的那样“在增强与群体成员的和谐性方面有着自相矛盾的效果。”(p.273)

结论

在很大程度上,戈登(Gordon)和我自己的研究小组的研究经验与安东尼(Anthony)(见Schwartz, 1970)所描述的研究经验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导致了以下结论:对新教群体的研究并不需要再现一种如贝拉(Bellah)所说的象征现实主义的限制性个案。实际上,一种视群体成员为正常人(当然群体成员也视研究者为一个真实的人)的公开的研究方法看来是贝拉(Bellah)的那个引起争议的概念的首选方法。并且,很讽刺地,这种能够最好地使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被赋予一种真诚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研究方法通常能够使研究者获得大量的信息。所以,这里所描述的这种较好的研究方法看来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像理查森(Richardson)等人(1978),特别是Rochford(1985)所描述的那样,更好的方法并非是没有其自身的困难的。然而,在“避难就易”和做秘密的隐蔽的研究之前,这种困难是能够和应该被克服的。

【译文选载】

田野工作中的守秘与披露

理查德·米切尔(Richard G. Mitchell, Jr)

陈玲译

导言

在20世纪80年代,我和我的社会学同僚艾林·波曼从事了两项长期的田野研究。第一项研究是对登山者——将登山作为业余爱好的人——进行的,第二项研究的是生存主义者。生存主义者预期各种可能发生的灾难——经济崩溃、种族战争、核武器袭击等——并采取措施以确保他们灾后的福利。这两个群体的公众形象迥然不同。如果我们将登山者形容为——如一个受访者所说——是“英勇无畏、热爱自由的运动员”的话,那么生存主义者的媒体形象大概是“全副武装应付世界末日的妄想狂”。这些研究给本文的主题——田野工作中的守秘与披露——提供了可做参照的例证。

第一部分主要是界定了守秘的形式,第二部分比较了实证主义者和符号互动论者视角下守秘与披露的恰当性。第三部分讨论了在与研究对象的认知和情感关系中,一种以守秘程度为基础的、

